

丁味略神父在香港的傳教使命與貢獻

田英傑¹

編譯：阮志偉²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一位意大利傳教士——丁味略神父一生的傳教事蹟，與及他與二十世紀初至戰前香港天主教的發展的關係。全文首先介紹丁味略神父初被派到香港新界西貢區傳教時所遇到的困難，然後他曾回到意大利擔當修院的院長，但仍對香港的人民念念不忘，他終於重踏這塊土地後，以愛及對上主的信德，堅持為處於水深火熱的基督徒服務，結果很可能被共產黨游擊隊，以他與日本人合作的藉口把他殺害。本文並非以「誰是真正兇手」的角度去撰寫，而是透過對事蹟的種種蛛絲馬跡，指出不管真相如何，殉道者的犧牲是千真萬確，他們見證了基督的仁愛、勇敢與決心。丁神父渴求熱烈完整奉獻生命的信德，勝過了對死亡的恐懼，再次在我們當中活出耶穌基督的精神，促使大家去尋求生命中真理的奧秘，推動我們為愛主愛人而作出犧牲的準備。

¹ 田英傑神父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本文取自田英傑神父於 1992 年的一篇意大利文著作，今特此編譯刊出。

²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哲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天主教研究中心榮譽副研究員。

引言

1926年，米蘭外方傳教會（Milan Institute for the Foreign Missions），與羅馬外方傳教的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神學院合併，成為宗座外方傳教會(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意大利文為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縮寫為 P.I.M.E.)。本文藉該會派到香港的一位傳教士——丁味略神父(Fr. Emilio Teruzzi)(圖一)一生的傳教事蹟，了解二十世紀初至戰前香港天主教的發展歷程。丁味略神父於1887年8月17日在意大利北部米蘭的萊斯莫鎮(Lesmo)出生。當他在米蘭教區修院進修時，他已對未來任務懷著一份熱情而且越趨成熟。其後他要求加入米蘭外方傳教會，最後在1910年9月29日夢想成真，開展他的抱負。於1912年6月29日晉鐸之後，他便準備好了做傳教工作。以下回顧他在香港服務的歷程，直至1942年日佔時期殉道為止。



圖一：丁味略神父(1887-1942)(萬籟寂神父提供)

從意大利到香港

Destination Hong Kong! (目的地香港!) 當他首次聽到香港這個地方時，心裏充滿莫名的喜悅。雖然自從 1858年4月10日傳教會其他神父開始到香港工作以來，他已常聽過這個地方，但仍滿懷理想³。前往香港前，他在倫敦短暫停留學習英語，並在1912年11月2日，與鄆若翰神父

³ 見 Gianni Griveller, *From Milan to Hong Kong: 150 Years of Mission: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 1858-2008* (Hong Kong: Vox Amica Press, 2008), p.7.

(Fr. Giovanni Battista Tragella, 1885-1968)一同乘帆船自熱那亞出發，於12月抵達香港。⁴

當時香港已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多年，而且英國人在十四年前亦租借了新界，但香港島的維多利亞城仍是歐洲人社區，但也有不同國籍人士居住。意大利神父自1858 到達香港後，除了向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徒做牧民工作外，都渴望向中國人傳揚福音。當時已有一些本地神父如梁神父 (Fr. Francis Leang, 1818-1884) 在赤柱及石排灣等港島村落傳教及施洗。而和西滿神父(Fr. Simeone Volonteri, 1831-1904)和穆若瑟神父(Fr. Giuseppe Burghignoli, 1833-1892) 兩位學習中文後即離開維城，在偏遠村落傳教。和神父在1860年到香港仔⁵，而穆神父則跟隨其後。事實上，他們並不滿足於島上幾個村落。他們正在尋找在中國大陸上開啟新的路徑，使後人(包括丁神父在內)有機會能更上一層樓接著到當地傳教。

西貢：早期傳教士的訓練場

當丁味略神父到達香港後便在主教府留了數天，並為嘉諾撒育嬰院(Canossian Holy Infancy Home)一位初生女孩施洗，隨即得到師多敏主教(Bp. Domenico Pozzoni, 1861-1924)的允許，到西貢區進行新的牧職工作。他並在資深傳教士羅奕安神父(Fr. Angelo Ferrario, 1876-1933)的指導下，學習當地的語言及適應其習俗。西貢是新來傳教士的訓練場所，因

⁴ 本文章所引用的資料，除特別註明外，均來自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特此鳴謝教區檔案主任夏其龍神父。

⁵ 宗座外方傳教會傳教士和神父(Monsieur Simeone Volonteri)在新安縣（即寶安縣）在新界鄉村傳教時，繪製「新安縣全圖」(Map of San On District, Kwangtung Province)。該圖在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時，成為英國政府重要的參考藍本。

為當地有一定數量的基督徒。而自從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以來，西貢多年來仍免受如1900年義和團起義時的政治動盪，而 1911-12年導致滿清皇朝被推翻的辛亥革命期間，西貢亦未有嚴重不穩情況，這造就在該地繼續順利地進行牧職工作。

西貢區可稽考的歷史，可追溯至十八世紀，當時整個香港，包括新界，都是清朝廣州府新安縣的一部份⁶。在丁神父抵達香港時，西貢已歸入英國租借的新界的管治範圍。新安縣的傳教首先由中國籍神職人員開展，鍾若瑟神父(Fr. Joseph Chung, 1783-1851)在1840年代前往荃灣開辦學校及設立一座小聖堂。他逝世後便由連瑪竇神父 (Fr. Matthew Lien, 1822-1854) 接任。之後，就斷斷續續由其他中國籍神父接任。

1860年整個清朝管轄的新安縣地區歸入為「香港宗座監牧區」(Apostolic Prefecture)。而負責廣州區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剛把原屬他們的傳教範圍而仍在清朝管轄下的大埔、西貢等地交給香港的意大利米蘭外方傳教士負責。⁷高監牧(Fr. Timoleone Raimondi, 1827-1894)首先進行探索之旅。他從荃灣起步，橫越大帽山而抵達十八鄉、林村、大埔墟以至碗窰（前稱碗陶），而返回荃灣。後來穆若瑟神父 1861年初接續住在他位於荃灣的居所，直至他在碗窰定居為止。

1862年，太和村傳教站設立，這裏更加接近廣東省橫崗，和神父在該地與一位來自香港仔而他相識的男村民早在1861年已開設了一間學校。很不幸地，在 1864因為風水問題，神父被迫離開這個地方而轉移至

⁶ 新安縣的縣官通常駐於南頭城，即今海灣對岸，另有兩個縣衙的分司，一在大鵬灣以北的大鵬城，另一在後來改稱九龍城的官富司，三個衙署一同負責管理香港、九龍及新界。

⁷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碗窰、鹽田仔、汀角》(香港: 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 2005), 頁 3。

離大埔墟不遠的汀角。⁸ 在汀角村，和神父在梁子馨神父 (Fr. Andrew Leong Chi-Hing, 1837-1920)，及穆神父與何神父 (Fr. Gaetano Origo, 1835-1868) 的協助下，開辦了學校⁹、建立小堂及居住的地方。在這段期間，神父們四出到村落遊走，認識新的村民及傳播福音。而和神父後來亦開始造訪西貢，認識客家人及決定開展在當地的天主教會傳教事業。

在幾年內，由於汀角堂區缺乏毅力，西貢便成為整個區域傳教士的主要居住地。香港於 1874年由宗座監牧區升格為宗座代牧區 (Apostolic Vicariate)，高監牧被任命為主教兼香港第一任代牧 (Vicar Apostolic)¹⁰。本地宗教會議 (Vicariate Synod) 於 1875年決定在香港殖民地分為四個鐸區：港島的灣仔至赤柱列為東區、灣仔至西環列為中區、西環至香港仔，包括英屬九龍、荃灣和大嶼山列為西區、復於中國內陸地區成立第四個鐸區，並進一步擴展至歸善縣(即現在的惠陽)及海豐¹¹，以西貢為中心。因此從那段日子開始，西貢正式成為傳教工作的「母親與搖籃」。由於內陸地區的傳教總部設於西貢，因此新的傳教士均被派往那裡作第一次的訓練，使該地確實成為基督信仰散播的重心。這個角色一直持續

⁸ 據說和神父命人在住所開鑿一扇窗，但在開鑿那天，村裡的一名嬰孩夭折，而另一女人則感到不適，村民相信是因為驚動了神靈，和神父只有離開。同上，頁 13。

⁹ 根據夏其龍神父的推測，這間學校的原址應在汀角村武帝宮旁的一塊空地，今已拆卸。同上。

¹⁰ Thomas F. Ryan,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s (P.I.M.E.)*, in *Hong Kong, 1858-1958*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p.67;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4)，頁 158-159。

¹¹ 見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 160-161。

到 1898年新安縣一部份被租借給英國，為期 99 年，成為新界。而新安縣另一部份則成為自治區。

二十世紀初艱辛的開始

羅奕安神父曾因病被迫回到意大利約一年，當他身體恢復良好狀態後，在1912年初與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返回西貢區。同年 12 月初，他們歡迎丁神父來到西貢。當兩位年長神父繼續在社區及學校探訪以及正在做牧民工作時，丁神父則全神貫注地研習中文。羅奕安神父曾描述 1913至1914 年間有關工作如下：

「這一年我不能再抱怨了。我已經在企嶺下建置新的聖堂，在4月 20 日同一天，當主教為聖堂祝聖時，我十分欣喜地為村中的婦女在當日施洗。除了原有的十二個傳教站外，這一年新增了浪茄村，那裡沒有聖堂、沒有學校、沒有住處。這裏的慕道者持續要求領洗，而我希望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至少其中一部份，故在隨後的聖誕感恩祭中為他們施了洗。幾天前，另一條村北潭涌亦有六個家庭決定加入天主教會」¹²

丁味略神父慢慢地學習幫助堂區的工作，尤其是在以拉丁文為主的聖事。1914 年 11 月，羅奕安神父再次生病而被迫召回後，丁味略神父在毫無準備下挑起重大責任，當他致函一位朋友時，便寫道：

¹² 參見宗座外方傳教會每月出版的刊物：《天主教傳教事業》(*Le Missioni Cattoliche*), 1914, p. 115。

「我還未掌握到語言，因為我仍必須要學習在很多村落中使用的客家方言……我們的基督徒大多生活在山中或海邊，他們每天依靠捕魚和種菜生活。他們通常是被動的。這裡不是因羊群而要維持牧羊人，而是牧羊人去供給他們所需要的。給我管轄的這個區屬於英國殖民地的其中一部份--稱為「新界」。它比我們自己的Brianza還要大。郊野優美，有無數小港灣和山脈。¹³

在1915年，丁神父得到楊倬華神父(1878-1945)的幫助。丁神父當時要管理15間教堂及小堂¹⁴，過了數個月的任期，他在其1914-15年報告中寫道：

「在浪茄村，婦女亦接受領洗... 介乎於浪茄和大浪之間有條漁民小村，名為西灣，那裏的人性質比較淘氣，但幾次都表明想成為基督徒。於北潭涌，有幾個新教家庭，家中仍然保持偶像、但亦有些異教徒家庭請求我為他們施洗入教，... 在十二月，大浪村舉行了慶祝堂區成立第 50 週年紀念的宴會，該堂區由和神父建立，而在所有村落中，我試圖尋找最多的教師和傳道員，但今年因為缺乏技巧，令人數減少」¹⁵

為了堅持舉行聖事，丁神父和他的國籍助理經常與十五個社群保持聯繫，但他們都聚集在小教堂及細小的聖堂中。神父需要在任何天氣走過陡斜的小徑才能到達偏遠的村落，丁神父亦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毅行者，出於傳教的熱忱，他造訪許多貧窮的鄉村，包括元朗、八鄉及大埔

¹³ 《天主教傳教事業》，1915, pp. 277-278. The Province of Monza and Brianza 是意大利北部 Lombardy 的一個行省，位於米蘭東北面大約二十公里。

¹⁴ 同上。

¹⁵ 《天主教傳教事業》，1915, p. 243.

等地。有些村落因散佈在海邊，他需要乘船才能抵達，但經常會在大海上遇到危險如風暴等。通過近距離的接觸，他成功地吸引許多村民甚至整條村信奉基督。當某些家族或鄉村表達加入教會的渴望時，神父便派遣一位傳道員為他們講解道理，由教導每天祈禱開始，神父亦會探訪他們，當他認為他們已充份準備成為新教友時，便為他們施洗。

在西貢及大埔建立教堂和學校

新界西貢及大埔的村落均是當時傳教士維繫社群的目標對象。如1916年，師多敏主教的報告中指白沙澳的社區正在重新恢復它的朝氣與力量，主因是建立了新的聖堂(圖二)，這令初來的丁神父感覺異常興奮。建立聖堂的資金來自一位購下他們已殘破的聖堂、學校和住宅的村民，因此「新聖堂建在高處俯視全村 ...」。由師多敏主教親自在4月25日祝聖，陪伴他的還有顏伯祿神父(Fr. Pietro Gabardi, 1866-1919)：他送贈了「聖母與聖嬰像」；甘沛霖神父(Fr. Angelo Grampa, 1882-1957)是建築師、石匠、木匠以及畫家；以及楊倬華神父(Fr. Joseph Yeung, 1878-1945)負責奠基。¹⁶

¹⁶ 《天主教傳教事業》，1916, pp. 321-324, 336.



圖二：1916年白沙澳村新聖堂建成後留影，取代原本於1880年建立的教堂(宗座外方傳教會提供)

1917年6月，對基督徒社群和鹽田仔陳氏家族來說是一個值得慶祝及歡樂的日子。其家族其中一個兒子陳丹書（Joachim Chan Tang-Shue, 1890-1975）晉鐸成為神父，6月2日亦有兩位晉升執事，翌日，陳丹書神父便回到島上主持他的首次彌撒，幾日之後他被派到海豐縣管轄當地。西貢有另一位新的神父：盧履中（Lo Lee-Tsung, 1889-1970）來到成為丁神父的助手。這兩位傳教士如同往常不斷地造訪每一條村，為忠實的信友舉行聖祭，並吸引新的慕道者入教，及在有需要時停留較長的時間，他們增加接觸元朗、八鄉及大埔等地，以增加與信友的接觸。

兩位神父也忙於修復被白蟻及颱風破壞的建築，並建構新教堂：如1918年在西貢浪茄建立的小堂、蛋家灣的居所及小堂、以及在1923年於

黃毛應建成的教堂。¹⁷丁神父又準備在西貢村的後山建一間大型學校和有庭院及門廊的住宅。丁神父收集到經費購買土地，但當他開始安排地基時便遇到大問題，不只在財務，當地人的敵對是主要的障礙。因他們恐怕斬去樹木會冒犯本地的神靈而帶來不幸，最終他花了很長的時間說服他們，甚至要當地警察的干預才能平息問題。

何達華神父 (Fr. Ottavio Liberatore, 1901-1972) 在 1930 年代負責西貢區，猶記得：

「西貢市集靠近大海：看起來像是流連在兩三個丘陵上的一條鰻魚，誰都不會敢去騷擾在村落中統治的魔鬼。其中前輩丁神父便證明過這點。當他試圖建立一所學校去提供更好的空氣、光線及生活給兒童時，他遇到整條村抵抗他。如果沒有英籍警察幫忙，（因村民驚他們比神靈更甚），他們可以將他切成碎片以解決問題。」¹⁸

丁神父在1922年建成幾間屋宅和改建舊教室成為女子學校（要在1926年才完成），然後他更集中在大埔開設了一間小堂。他的計劃是要

¹⁷ 黃毛應村位於西貢墟的東面，在大網仔亞公灣附近，是一條原只有十多戶人家的客家村，人口最多時有一百人。黃毛應村於日治時期曾經抵抗日軍，於1941年，廣東抗日人民游擊隊和日軍戰鬥，並組織港九人民抗日游擊隊（簡稱港九獨立大隊），1942年2月在該村天主堂成立。當時全村只有青年十四人，其中六人參加了游擊隊。1944年，日軍突襲黃毛應村，當時游擊隊已撤走，日軍於是把全村成年人和男性囚在教堂內嚴刑迫供，村民鄧德安被燒死，鄧福及鄧戊奎被燒及打至重傷。見鄧振南，《香港九龍新界西貢區黃毛應村原居民登記冊（族譜）》（香港：黃毛應村，2008）。此外，過往神父每年只在這裏的天主堂舉行彌撒數次，彌撒當天，村民會用響螺殼吹號，通知附近的教友鄉村，如蛇頭的村民，到來參與感恩聖祭。見胡綽謙主編。《西貢鄉文化探索》（香港：西貢區鄉事委員會，2013），頁26。

¹⁸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西貢 IV-14-1。

建成附設宿舍的另一間聖堂，成為另一個堂區的總部，最終在 1926 年 5 月 1 日完成工程。當年，丁神父在大埔墟附近的小山（即錦山）亦建成聖安德肋堂，並在旁加建了宿舍兼作傳道員的學校。¹⁹ 丁神父在 1923 年 8 月 15 日的年報中指：

「這一年沒有重大或任何新的事件，但我兩間在大埔及西貢的新教堂兼有教育活動抱有希望能結出果實。雖然培養新教師與傳道員需要的開支超過我的預算，但沒有這樣的努力，我們根本不能得到我們所需的老師和傳道員。這年嘗試開辦女子學校並未成功，但為了堅持信仰的需要，這所學校必很有用，因為村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西貢的學校開始長出果實，而且我希望在未來幾年內，能擁有一班核心的好老師和傳道員...」²⁰

在 1923 至 1924 的下一份報告中²¹，丁神父寫了關於師多敏主教 (Mgr. Pozzoni) 在 1923 年 12 月最後一次牧靈探訪的細節：「這一年的大事就是仁慈的主教造訪他的鐸區進行牧靈工作，他探訪了所有傳教站，即使是最小的，就是他從未探訪過的... 是他在鐸區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的工作！」。師主教最終在 1924 年 2 月 24 日死於心臟病。此外在報告中，丁神父亦強調對西貢區教友的一份感情：

¹⁹ 當時大埔堂區轄下有粉嶺、上水、沙頭角、打鼓嶺、沙田、元朗及荃灣等。見 Thomas F.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Reprint)* (《1962 年香港天主教指南》(重印))(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2), pp.183-184: 「...當鐵路於 1910 年向中國邊境推進時，遠至粉嶺及上水等地的天主教徒亦能前來聖堂，當聖堂開幕時，已有大約一百位教友。」

²⁰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西貢 IV-13-2。

²¹ 該報告之日期為 1924 年 8 月 15 日。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西貢 IV -14。

「為了『他們』的老神父及主教，就如『他們』喜歡稱呼他，他們的慰問所表達的敬意是超凡的：「在每條或大或小的鄉村，均為他們鍾愛的主教舉行追思彌撒，為這位神父而哭的不計其數，我相信沒有其他鐸區比這個有更多人為他禱告了。」²²

根據以上同一份報告，因為中國大陸發生社會動盪，有許多人逃難來到大埔定居，公教徒的數目比去年增加二百人至 1,725 人。另一件重要事是西貢的中英雙語學校崇真學校的重建及正式開幕：

「舊課室已不足以應付快速增長的學生人數，再者地方封閉及悶熱，許多可憐的學生懶洋洋地睡在桌上。許多學生因而缺席使我憂心忡忡，現在新的課室空氣流通，學生熱烈地唱歌和感謝主，直到現在我還沒有任何缺席的記錄。」

事實上崇真學校的開幕，亦使丁神父多了來自西貢墟的村民朋友：

「學生不只在日間來，即使是生活在街市內那些人，也問我是否可讓他們睡在這較涼快的地方……這是由於學校是建在有許多古老墓穴的山上，清新的空氣、神奇的位置及涼快均比愚蠢的恐懼多強烈。在下一學年，這個美麗的地方和老師亦將會大幅增加。」²³

除了傳教工作和基督徒的照料外，丁神父也受委託訓練一些年輕的同事，這亦證明了他也是位理想的導師。在 1921 年年底，兩位年輕的神

²²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西貢 IV -14。

²³ 同上。

父：韋祿師神父(Fr Riccardo Brookes, 1892-1980) 和達依理神父(Fr Pietro Daelli, 1893-1965) 亦受託在西貢傳教。1922年年底，達神父搬到另一地區，而韋神父繼續留下協助丁神父，學習他的傳教方法和精通附近地區普遍的兩種方言。丁神父還陪伴新的傳教士去到他們的新工作崗位。例如1925年，當南中國發生內戰時，他也到訪過位於香港以外的淡水，他寫道：

「我要去支援年輕的傳教士，並幫助他當碰到了這些叛亂者時解決某些困難。這裡內戰是介於兩個將軍之間... 在我們到達時，庭院、教堂和房子都裝滿了人，特別是女性，均受了驚。基督徒在祈禱，而異教徒不作一聲..當我寫信時我仍然可以聽到不遠離此處的大砲聲。該城鎮總算是平和的：軍隊已差不多全部離開... 誰會是贏家呢?」²⁴

難以承受的重擔與主教新的任命

進入二十年代，新界東鐸區亦開始出現困局。1926年 5月1日教區再將新界劃分成東鐸區(西貢)、西鐸區(大埔)和離島區。韋祿師神父負責後面兩個區域，而丁神父則仍然負責東鐸區(西貢)的事務，此區的公教徒數目已縮減至 1,620，形成 14 社群，有 8 間教堂和小堂。這說明了為何丁神父於 1927 年 9 月報告中，開始抱怨「降低了的宗教精神」、「缺乏新皈依」和「和應該知道得比傳道員更多、但已不去聆聽更多的信

²⁴ 見《天主教傳教事業》，1925, p.147.

徒」：「讓我召集到成人領洗者都是在公教村落中剩餘的一些異教徒，換句話說，某些領洗者都是已經是公教徒的丈夫的太太而已。」²⁵。

經濟困難也已成爲難以承受的龐大壓力。如所有其他傳教士一樣，丁神父只收到由主教而來的小量資助，故經常要找其他恩人或借貸才能支付全區的開支，因此丁神父曾詢問當時恩主教可否被派到其他地區。最終他因繁重的財務負擔，而向主教提出辭職及澄清：「教堂和小堂，傳教士的住宅與教室都需要大規模修復。我有個人龐大債務，此外其利息會將我僅有從津貼及彌撒奉獻而來的零用錢花光，但我仍然無法承擔任何新的開支。」²⁶結果其職務從1928年起由達依理神父 (Fr. Pietro Daelli, 1893-1965) 接替。

丁神父離開東鐸區的職務後，他的才能被主教所發掘，從而接任了多項重要的職位。當恩理覺神父(Fr Enrico Valtorta, 1883-1951) 被任命為師多敏主教的繼任人及在1926年6月13日祝聖時，丁神父已顯示他作為司儀指導主教晉牧的莊嚴大禮的組織能力。恩理覺主教很快瞭解到他身邊要有一個在法典和禮儀事務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想到沒有人比丁神父更勝任這一項工作了。所以主教很快就同意了他離開西貢的請求，並派他到教區主教公署工作。1927年8月2日，他首先被任命為檔案主任，並宣佈成立本地資料庫。他亦趁有空閒時間去整理有關傳信部 (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SCPF) 所獲得的檔案，該些檔案是由若瑟監牧(Mgr Theodore Joset, 1804-1842)作為首個宗座監牧區(Apostolic Prefect) 的總務長於1841年帶來的檔案，這些檔案包含關

²⁵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西貢 IV -14。

²⁶ 丁味略神父至恩主教的信函，1927年3月14日。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西貢 IV -14。

於中國傳教事業的珍貴文件及資料。早於1922年，當羅馬教廷在北京設立宗座駐華代表(Apostolic Delegation to China)時，他們已要求這些成果要被好好利用，因而部份文件被傳回羅馬，另一部份被傳送到北京。²⁷

因此丁神父很快便根據新法典及上海全國天主教議會(1924年舉行)的規範進行整理。首先，他將所有傳信部檔案文件寄到在北京的宗座駐華代表。在同一時間，他懇請所有在殖民地及大陸地區的傳教士將他們的領洗、婚姻登記冊及文件複本寄予本地的檔案單位。然後他從代牧區的歷史開始，所有相關事宜目錄化及複製文件，並以清楚的文體撮寫其內容，有耐心地整理和存檔。結果是相當令人印象深刻的。從他的工作和研究，他編成「香港代牧區的簡史」(*Breve Storia del Vicariato Apostolico di Hong Kong*)，並列印成八十九頁的書本。至今我們仍可在本港的教區檔案處找到這幾本手稿書籍，它涵蓋了香港天主教早期歷史至1860年。在1930年5月27日的信函中，Fr. Gian Battista Tragella (1885-1968)，前PIME 檔案主任和歷史學家，曾對該書進行研究，他解釋：

「... 關於這個簡史，我須告訴你它是單純的草稿和只是一種需要修正文字的印行本。如有關的傳教區的真實歷史，我必須承認，在收集到我可以找到的所有的文件後，我覺得這麼短的材料我不知道要寫下什麼。因為歷史是依據事實並不是在於想像，因為我無法找到它們，我停止了工作和開始將檔案轉換為清單，希望能找到材料繼續書寫。」²⁸

²⁷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III-1。

²⁸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I-23。

但丁神父無法完成它，原因是1927年11月19日他正式被任命為監牧區總監及主教座堂主任。除了作為秘書處理主教公署的職務外，作為禮儀主管，他要安排與指導所有重要禮儀紀念活動，尤其是在每年大禮、神學生的晉鐸禮等。他在閒暇時間，更會到各堂區主持主日彌撒及在學校和宗教社群中聽告解。

然而他仍與西貢保持聯繫，特別是一些特別紀念活動或在某些堂區出現財政問題時而要處理的時候。當其他神父生病或缺席時，他也會替他們主禮。在奧斯定神父(Fr. Agostino Placzek, 1874-1928) 於1928年9月26日逝世時，他更負責了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幾個月，直到新神父被任命為止。自1933年1月至翌年1月，他曾為主教座堂的主任司鐸。即使他不熟諳英文，在主教座堂主日十一點的彌撒中仍很有熱誠地講道。在主教座堂及聖瑪加利大堂，他亦熱心地鼓勵教友成立公教進行會(Catholic Action Association)。

從1930年3月起，他被任命為殖民地監獄的神師，探訪囚犯並為他們舉行聖事。他常常在精神上陪伴那些囚犯的皈依旅程及為死囚施洗。6月起，他亦成為了寶血女修會的助理神師。以後幾年，他也同時是幾個女修會的聽告解神父。1932年，丁神父曾為四個被判處死刑的殺人犯施洗，並受到媒體關注。第四個殺人犯於1933年1月執行極刑，他為其施洗的新聞成為香港天主教一件轟動的大事，這驅使主教向當時的港督要求赦免。當有關死囚被改判終身監禁的消息傳出時，天主教內一片歡呼聲，該囚犯的母親更親自向主教感謝他的幫忙。除了對囚犯作簡

短探訪外，他亦獲准在監獄每年舉行至少四次彌撒，即復活節、五旬節、九月以及聖誕節。²⁹

公教童軍的倡議者

除了上述的牧職工作外，丁神父對提倡成立公教童軍亦很感興趣，更是面向殖民地政府的正式代表。在1930年3月30日的傳教大事年表中有這樣的記述寫道：「丁神父，作為公教男童軍的神師，他與聖若瑟中學的公教教師進行聯繫，希望能成立一支公教童軍隊」。當時在教區及修會所辦的學校內，作為香港童軍總會成員的男童軍與女童軍隊伍已相當活躍（該會於1927年成立總會）。而自丁神父擔任神師以來，一直很熱切地與總會合作，提倡組織公教童軍運動。1930年4月，他首先向意大利公教童軍協會查詢會章的細節。然後在1936年6月6日，他與香港童軍總監談及組織顧問委員會和公教童軍的特定事項，並於11月16日，在童軍的週年大會上當選為其中一位成員，亦成為香港的公教童軍代表。女童軍的就職典禮則在1930年10月尾的基督君王節後舉行。

丁神父為了推動公教童軍運動，在九龍區成立另一支童軍隊，並增加在學校及聖堂的隊員數目，如在聖德肋撒堂、玫瑰堂、喇沙書院、西貢天主教中學及其他地方。在其他公教童軍活動中，丁神父亦得到主教座堂的隊伍導師陸榮生的協助（D.W. Luke）。³⁰

於1931年12月27日，在主日禮儀後，巴西總領事Mr. Valdemar De Araujo 得到全體成員推舉成為香港公教童軍會長。他表示很高興成為會

²⁹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西貢 IV。

³⁰ 陸榮生先生於1953-1954年擔任香港童軍總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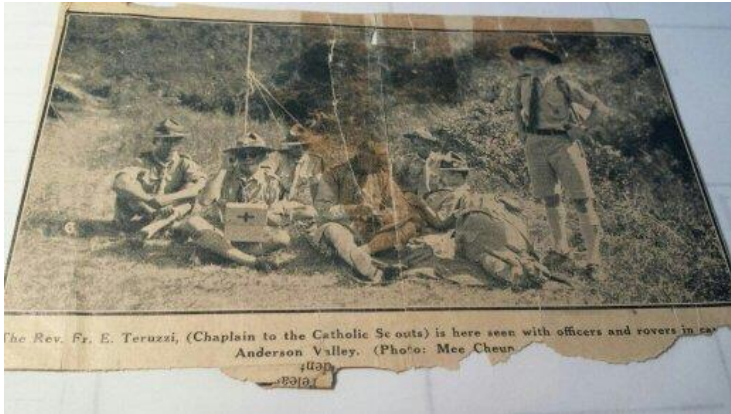
長，並承諾會積極參與公教童軍運動。然而，在 1932 年 3 月 2 日有消息指他已經升任為巴西一級領事而要離開香港。故此在 3 月 20 日舉行了歡送會上，他的職務由耶穌會潘佐治神父（George Byrne）（1879-1962）接替。

與此同時，丁神父持續推廣公教活動和組織每年一次童軍活動。他還特別注意到宗教紀念活動，確保會出席有關活動及派出童軍與女童軍到場服務。他非常關心這些聚會，如 1935 年 5 月的遊行(Jambo-rally)（當中澳門與廣州童軍亦有參與）、1936 年 5 月 24 日在大堂舉行的、有全港公教童軍與女童軍參與的英帝國日（Empire Day）慶祝會及在 1936 年 11 月 7 日在木球會舉行的大營火會，該日由公教童軍表演體操。

丁神父喜歡陪伴童軍一起露營及戶外活動。雖然他已年屆五十，他很樂意跟年青人遠足及參加夏季和冬季營。長途的旅行通常是訂在 8 月。1930 年 8 月 16-21 日，他為童軍組織到了廣州訪問，造訪大堂、中山大學、黃花崗烈士紀念碑及黃埔軍校和其他機構。1931 年 8 月的澳門之旅是一次卓越和難忘的旅程。8 月 12 日早上 11 時丁神父帶同一班男童軍到達澳門碼頭，並獲得澳門童軍的歡迎（12th Escoteiros do Portugal），送他們到慈幼會樓的宿舍。翌日 Paiol de la Flora 麵粉倉庫爆炸，導致 21 死和許多人受傷。因為距離慈幼會宿舍有一段距離，所有童軍安全。8 月 15 日，在為葡萄牙遇難者舉行的莊嚴的葬禮中，澳門及香港的童軍展開遊行，並向死者獻上徽章及獻花。在 8 月 18 日，在拜訪澳督後，便返回香港。

在 1932 年 8 月 14 日，丁神父帶同一班童軍到牛池灣安老院，他們在這裡參加彌撒，快速地食過一頓早餐後，開始步行到西貢，在那裏露營至 8 月 19 日(圖三)。1933 年 8 月 26 日，神父陪同四十位公教童軍(香

港公教童軍第二旅)到廣州參加夏令營，直至 8 月30日。1934 年 8 月 26 日他與 26 個童軍坐船到上海訪問一週。在 1937 年 2 月，丁神父與七個童軍到馬尼拉出席聖體聖事會議，是他最後一次以神師身份出席重要活動，因自 4 月開始他便回到意大利。³¹



圖三：丁神父(中)與一班童軍領袖於安達臣谷(約1930年代)

在意大利仍心繫香港

由於丁神父的家人要他回到意大利稍事休息，因此他向主教要求暫時離港而獲得批准。他並在假期中慶祝了晉鐸25週年紀念。當時剛巧服務印度的傳教士 Gabriele Sauberer Arosio (1892-1963) 於 1935 年被召回意大利，並被派往前意大利殖民地埃塞俄比亞出任宗座監牧，加上 Villa Grugana Brianza 學院院長一職仍然懸空，因此總會長決定要丁神父留在意大利多一點時間，更於 1937 年 9 月被任命為該學院的院長，學生有

³¹ 位於大埔的香港童軍總會洞梓童軍中心，建有丁神父紀念堂 (Father Teruzzi Memorial Hall)，由包羅之修士(Bro. Polo Vittorio, 1915-1984)及高利安修士(Bro. Colleoni Mario, 1901-1988) 負責籌建。

45人，所有學生均是高中第一與第二級班。雖然是新的職位和人員，他很快就與大家建立友好關係。正如他在其信函中寫道——「與上長及學生很快成為朋友」。

與此同時，香港傳教區計畫在英格蘭開設新的神父辦事處，以方便新的傳教士學習英文。故此丁神父轉到倫敦做可行性研究，但結果發現可能性極低。恩主教於是向他寫道：「如果是這樣，而且99 %可能，您最好還是坐第一班的輪船回香港，你的新辦事處已經擴大和美化，而且有一班童軍正在等您回來」。但是總會長（General Superior）有另外一個計劃，並於1938年8月將丁神父轉到Treviso學院擔任院長。到了1939年5月29日主保瞻禮當日，根據本地大事年表中的記載：「我們親愛的院長，是悲劇漫畫的詩人，也是至聖又世俗的作曲家，愉悅和哀悼的詩在交織著，感謝與敬愛我們的司鐸」。他對傳教任務一向充滿熱誠，當時恩主教來信勸他回港時，他立即要求可否容許他放下工作，回到他愛護的中國人民當中，和恢復他在香港的各種職責。

日佔時期：失控與危險

根據1940年的「香港傳教區大事年表」，丁神父確實重新出任離港前所擔當的職務，包括秘書長、檔案室主任、禮儀主管、監獄特派司鐸及公教童軍神師等。在1940年5月26日的記事中，他對當時的即將爆發的香港保衛戰有這樣的感覺：

「今天我們以一貫莊嚴的方式慶祝聖體聖血節（*Corpus Domini*），這也是為戰爭而祈禱的特殊日子。我在主教公署出任伯多祿神父（*Fr. Garbelli*）的職務：每一天早上我仍走到聖若瑟

中學做神師。直至今天修院沒有發生任何事，而且如果意大利不參與戰爭，我們將不會有太多問題。」³²

不過這種狀況已變得越來越脆弱。自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起，日本已正式入侵中國，而且當意大利與納粹德國及日本結盟為軸心國，使意大利傳教士更為危險。1941 年 4 月起，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所組成的共產黨游擊隊，後來成為東江縱隊的其中一支隊由曾生將軍 (1910-1995) 於 1939 年成立(圖四)。為了進行對香港的活動，他們的總部設在大鵬灣北岸的土洋的天主教堂內。



圖四：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邊界附近行軍情況(1945年)(香港政府檔案處提供)

雖然在戰爭爆發前與意大利的通訊已很難，但丁神父仍能與某些朋友和天主教傳教雜誌 *Le Missioni Cattoliche* 保持接觸。這本雜誌發佈由神職人員傳送去的新聞。在這本雜誌中刊載了一篇由丁神父傳過去的文

³² 見 Letter of Fr. Teruzzi, 26-5-1940, published in *Hong Kong, Missionee Martirio* (Tiemme, Milano 1992), p.30.

章，是1941年6月21日所寫的，從中可以更詳盡地了解他及其他神職人員在戰爭邊緣的危險狀況：

「我們與中國領土內的神父被隔絕，沒有人敢於陳述，因為這裏有官兵及土匪掌控著。在香港我們準備最壞的情況時，同時希望風暴不是向著我們來襲。我們亦在聖神的光照中慶祝恩理覺主教被祝聖十五週年……讓我們感謝上主，畢竟他仍在這一年的憂慮和恐懼中保佑我們，尤其是當我們被侷限於住處。有好幾個人需要離開這個殖民地的，包括仍在澳門的五位和在中國領土內的三位。我們在這兩個城市的神職工作，卻沒有因為這年的戰爭而萎縮，事實上我們仍不斷擴展慈善工作和對社會的援助承諾。」³³

在西貢區域，由日軍所控制的地區仍有兩位中國籍神父服務，即年輕的郭景芸神父及較有經驗的黃子謙神父。郭神父是首位福佬（或稱鶴佬，Hoklo）神父，三十多歲和只有五年的經驗，在惠陽工作三年後，1941年11月起在該地工作，特別照顧崇真學校。而黃神父則近六十歲，已有二十五年的牧職經驗，自1930年起已在大浪村一帶傳教。他在1927年平安夜於海豐區汕尾，連同白英奇神父、路比神父及七名嘉諾撒修女一同被「海陸豐蘇維埃」的共產政權所擄去。他作為中國人竟被判處死刑，但其後幸得恩理覺神父介入，借用英國戰艦「天使號」發動突擊，他們才僥倖脫險。由於局勢動盪，兩位神父在西貢區的居所和行蹤也很保密，行事謹慎，每次當他們離開住所，都要考慮周詳。³⁴

³³見《天主教傳教事業》，p. 42.

³⁴ 田英傑，「西貢三神父殉道簡史」，《公教報》，1992年8月28日，頁1。

1941年12月8日，日軍轟炸啟德機場，正式攻擊這個英國殖民地。經過首五天的攻勢，日軍已侵佔整個新界地區。由於意大利早前已與日本結盟，當時所有意大利的人員均被港英政府視為敵國公民，並被送進位於赤柱的集中營。到了聖誕節英軍投降後，香港的日佔時期正式開始。12月10日，日本陸軍的幾個支隊進入西貢，掠奪村民的農作物和食物。他們在那裏停留一陣後，向九龍推進，期間洗劫了蠔涌和壁屋一帶的村落。在殖民政府投降後，日軍返回西貢以控制該區域。與此同時，聖誕節之前土匪已經在西貢出沒，冬至日他們更配備槍械將所有居民的貴重物品掠去，並強迫他們將穀物擔至企嶺下，讓他們可以在那裏坐船離開。當時據報土匪在整個區域橫行、並分成八至十個成員的派系，從事走私活動，並定時到處要求物資與金錢。

對整個殖民地來說，日治時期既是一場惡夢，亦是充滿苦難、恐懼和飢荒的時期。當時食物已十分短缺，而在市區日本當局更催迫人們離開，每人均要盡可能逃到其他地方。自1942年1月至4月，共有六十萬人離開香港，使人口逐漸地減少到五十萬。許多天主教徒亦逃到澳門，使本地教徒數目由21,000人減少到只有4,000人，不離開的人就有機會餓死，因為每天每人只可獲配給90公克食米。結果在這段期間有五萬人死於飢餓，而將他們埋葬的工作亦落在教會身上。天主教會及神父均負責這方面的工作，以梵蒂岡提供給戰爭的受害者的基金支持，派發不同的物資給有需要的人士。但卻發生了不幸事件：1942年8月，當郭神父與另外七、八名人士(包括數位教師)在西貢的廣場傾談時，突然被全副武裝的部隊擄去。初時人們還以為是一宗綁架要求贖金。然而，由9月開始已清楚地知道他們已經被殺。有人曾見過他們被綁在一艘船上，被帶

到深山殺死和埋葬。³⁵黃子謙神父，一樣受到丁神父的熱情的驅使下，探訪多一些村落，但亦在數日內於某個黃昏在赤徑失蹤。有一段時間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人們逐漸地懷疑他也是被謀殺了。他被游擊隊擄走後帶到大浪附近山邊，被殺後並偷偷地埋葬，時間大約在 11 月底至 12 月初。³⁶

除了神父在日佔時期仍舊服務村民外，其實當時共產黨的東江縱隊游擊隊本身亦盡力取得村民的信任及從村落招募成員：以愛國主義方式，用盡所有方法來防禦偏遠村落受土匪的攻擊，以免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中，他們又與香港獨立大隊合作，協助有需要的人士離開香港³⁷。游擊隊在赤徑使用天主教堂作為宿舍，招募主要是客家人的本地居民參與，1942年初游擊隊人數已有三百人，藉此發動在每個村的「人民活動」。他們在鹿湖設立集訓基地，靠近西灣村。他們亦有條不紊地為偏遠村落防範土匪，並成功控制和接管所有人和物資的走私活動。東江縱隊逐漸對本身的組織變得更有信心和展開更多工作。為了對抗日軍而作出種種的報復：伏擊日本船艇、殺掉被視為同謀者的中國人（於 1943 和 1944 之間，他們殺死了日方最重要的三名中文翻譯員）、蒐集情報、破壞火車和襲擊日本人警署。³⁸

³⁵ 田英傑，「西貢三神父殉道簡史」，《公教報》，1992年8月28日，頁1。

³⁶ 同上。

³⁷ 屬於中國共產黨東江縱隊的香港獨立大隊於1942年2月3日於西貢黃毛應教堂成立。

³⁸ 引自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kung, 1940-1950: The Oral History Project* (1982), p.49, 52,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西貢 IV-14-2)。

愛的決定與犧牲

丁神父因深愛此區在這裏傳教多年，對局勢變得憂心，但仍與主教及傳教會議找尋合適的人選去接替郭神父在西貢的職務。事實上，他表示自己是最適合的人選，因為他很熟悉那裏的人與地點，願意成為西貢區的一位留宿神父。恩主教則採取觀望態度，但丁神父仍十分堅持，恩主教最終惟有給予他短暫的准許，但要求他在限期內完成探訪。³⁹

1942年10月5日大約傍晚六時，丁神父起行重踏西貢。翌日早上他聽告解與送十數個聖體，其後造訪日本主管當局，從而取得權限留在那裡傳教。他當時發現有些房間被親日居民組織「西貢自治委員會」佔據，並獲得郭神父默許的。他也探訪了一些公教家庭，試圖找出有關郭神父被殺的資料。他又撰述當地艱困的狀況及人民的迫切需要，還有些他獲得的關於郭神父的消息：「看來此處的主要考量是要擦去所有被擄去的人的痕跡... 這天晚上我到市場，我得到大家的真誠歡迎，尤其是由我曾任教學校的學生...」。在西貢花了兩天後，翌日他又去到由港九大隊所控制的黃毛應村。他寫道—

「我上個星期四和星期五到訪黃毛應，原先預計會在星期日回去。但他們勸阻我不要回去，因為恐防游擊隊的幽靈突然出現。感謝天主，教堂的損毀不算嚴重... 星期六，我到訪企嶺下：真是災難。那裏沒有一件東西留下，連木樓梯也沒有，星期日我到窩尾觀察...」⁴⁰

³⁹ 田英傑，「西貢三神父殉道簡史」，《公教報》，1992年8月28日，頁1。

⁴⁰ 見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 IV-14。

他繼續向主教報告，並向他申請延長留在西貢的時間。又寫道——

「我希望到訪糧船灣及最後到鹽田仔。我應該也要去井頭、崙下、大洞、烏溪沙探訪當地的基督徒，但如果您不允許我申請延期，我不能這麼做。如果您決定給予我批准，請讓用中文撰寫一封精簡的信，使我可以提交到日本警察的頭目手上。我可以完成是：畢竟我留在這裡是對基督徒的一種鼓勵。很遺憾的昏暗天氣防止我進入更無遠弗屆的地方。」

在恩主教允許下，丁神父可以到訪其他村落，完全了解到他所冒的風險有多大。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北潭涌(10月14-16日)：

「因忠誠與對我的信任，我有幾個有良知的人幫助。每週六我去浪茄度過兩晚... 在這兩個地方沒有人給我任何麻煩。很不幸地，在浪茄我不能為所有人進行週年修和聖事和聖體聖事：從1941年12月至1942年10月沒有任何傳教士到過該村。當我離開浪茄前往沙嘴角時，我遇著五名游擊隊員，其中一個來自此村。他們剎停和查詢我，看到我是一隻沒有尖牙和爪的怪獸，他們讓我平安地通過，當我們分道揚鑣時更像好朋友似的——感謝上主。翌日，因著天主的旨意，我到過鹽田仔這島嶼，十五天前黃神父仍在這裏舉行主日彌撒。在去窩尾之前只想停留兩天，因我打算留在西貢處理幾件事情... 那裏生病的人不少，但有還要比疾病多的濫權情況需要解決。這裏亟需傳教士永久駐在此處。」⁴¹

⁴¹同上。

於 10 月 23 日雖然丁神父已在往窩尾途中為「基督君王節」準備，恩主教寫給他道：

「首先、感謝您已完成的事。謝主 *Deo Gratias!* 我還是希望您返回香港，不遲過諸聖節。11 月 8 日我們進行靈修練習。我還是不想您留在西貢。我相信最後會有另一位意大利神父永久地被派當地。我建議您——事實上我是命令您，要經常保持謹慎行事，以免暴露於被擄去的危險中。」⁴²

當他返回香港時，丁神父確認他對西貢的正面評估。住在香港主教座堂鄰近神父宿舍的江志堅（*Quirino De Ascaniis, 1908-2009*）⁴³寫道：「我曾遇見他一次。他完全對自己的傳教工作心滿意足及對所住的地方的情況非常有信心。他的字裏行間對身處的地方均認為是好的、沒有任何危險。」⁴⁴丁神父仍十分堅持返回西貢。主教在靈修練習前完全忽略他的請求，但是丁神父仍對靈修非常熱衷。主教雖然不被說服，但仍要讓他走，並於 11 月 16 日任命他為西貢的主任司鐸。就在他出發前，主教給他一大筆金錢，是由教廷提供以協助戰爭的受害者，可以分配給最貧困的家庭。此外，他亦確認他的工作為總管，並提出他每個月要有十天時間住在香港那邊。就在那日，丁神父出發前往西貢作最後一次的旅程，迎接寂靜但冷酷的死亡。

⁴² 見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 IV.14。

⁴³ 江志堅神父於 1933 年到香港，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他於 1953 至 1961 年期間任西貢區主任司鐸，他退休後曾住在九龍牛池灣聖若瑟安老院，見香港：本會現況 <http://kkp.catholic.org.hk/coko2956.htm> (取用日期: 2016-12-18); 《公教報》，1992 年 8 月 28 日，頁 1。

⁴⁴ 見香港宗座外方傳教會檔案處，江志堅檔案。

11月18日，丁神父派信差回主教座堂取回自己留在房間的物品，並帶同一封信交給座堂，當中寫道他在西貢見證的暴力場面：

「在我們的靈修練習的那個星期，西貢的日軍已作出變動。在這裡的官兵是最糟的，他們搶劫，他們毆打，他們已經殺死數人。其他的就被六隻兇猛的狗所撕開。將鄰近村落的村民載到目的地的渡輪已暫停服務。它（日軍）是恐怖的朝代。我正在想可以做什麼來幫助這些可憐的中國人」。⁴⁵

雖然情況是相當困難和危險，但丁神父未有打算改變他探訪天主教徒的計劃。途中他探訪一些在企嶺下的基督徒家族，然後向大洞前進。他要留在基督徒家庭過夜和舉行彌撒，因為那區沒有小堂。⁴⁶ 11月25日早晨，他與傳道員及僕人剛在大洞村(圖五)一教友家度宿，以準備舉行彌撒後前往鄰村，當他正在穿上神聖的祭衣，一群配備武裝的游擊隊突然破門入屋，命令他跟著他們離開。神父要求他們給予少許時間讓他送聖體但遭拒絕，要他立即離開，他沒有逃走只好跟著他們。因此他與傳道員就此被帶走，但完全不知道要去什麼地方及為什麼。那群游擊隊不理會僕人的阻止，只說會很快送他們回來。有人見到游擊隊從村落走到海邊，上了一艘船並駛往北面的海岸(圖六)。不久有些士兵回來亦將仍在那裡等候的僕人一同帶走。⁴⁷

⁴⁵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編號 IV-14.

⁴⁶ 這裡是根據江志堅神父所知，一位天主教叛徒知道丁神父的旅程計畫後，便通知在深涌的游擊隊，從這條村落中游擊隊雇用一位非天主教男人和他的船，用來載運丁神父到不知名的目的地。

⁴⁷ 田英傑，「西貢三神父殉道簡史」，《公教報》，1992年8月28日，頁1。



圖五：今天的西貢十四鄉大洞村



圖六：1942年丁神父被帶到企嶺下海後遇害

從其後的追查中發現，當時丁神父在那艘船上已被殺，由於發現他的身體時頭骨骨折，相信是有人以石塊之類的硬物襲擊其頭部至死。他的屍體更被一大石綁著，沉下海底。但期間石塊脫下，其身體重新浮上水面，被海浪沖上深涌北面一個內灣的淺灘上。約一星期後潮退時，有婦女（其中有些是天主教徒）在執拾貝殼時，發現他的身體被繩索綁著在大海漂浮。他們立即認出是丁神父，因為他穿著歐洲樣式的襪子，黑白色的鞋底，與及他的一隻金牙。他們立刻跑去通知其他基督徒。他被安靜地埋在一處山坡上，離開海灘不遠。⁴⁸

根據另一個消息來源，是由共產黨首先發現他，並要求一些農民埋葬他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基督徒非常小心地按共產黨的提議將其埋在較高的位置，而不是在沙灘上，對於傳道員及僕人，則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

對神父遇害的調查

1943年1月2日，羅馬傳信部經駐東京的教會代表向恩主教發出電報，宣佈郭景芸神父(Fr. Renatus Kwok King-Wan, 1911-1942)、黃子謙神父(Francis Wong Chi-Him) (1894-1942) 和丁味略神父是「被西貢區的中國土匪所殺」，當中沒有案發日期、地點或任何謀殺的細節。消息來源是一份以拉丁文撰寫的報告，日期是1942年12月3日，可能是由一位中國籍神父所寫：

「8 天前、或甚至更早，*Han Ah-Kung* (西貢聖堂的管家)勸喻丁神父不要往偏遠小村落冒險而行。因為他說有游擊隊，他們視他

⁴⁸ 同上。

為中國的叛徒。丁神父不同意並指他是一位神父並非叛徒。他只是照顧基督徒的靈魂，並沒有擔心。在同一天，神父造訪大洞、井頭及烏溪沙，並說他應該會在兩天後回來。但他之後再沒有返來。昨夜一位住在島上、經常到西貢作買賣交易的基督徒告訴 Ah-Kung，丁神父已經遇害，他的屍體已經被尋回並已被埋葬。但沒有人知道是幾時或如何。」⁴⁹

當眾人確定丁神父在香港遇害後，恩主教舉行了一次為他們的亡靈的追思彌撒。聖堂擠滿了來參與的信徒，主教因他們的犧牲落淚。因為日治時期及有共產黨的存在，在這段時間內不可能進行調查及搜尋埋葬地點。直至到1945年10月當英國人回來後，恩主教及其他人才抵達西貢搜集更多資料。

當西貢的生活回覆正常，陳丹書神父在一些深涌的天主教徒協助下，成功追查到墓穴所在。骸骨被火化被放在一個木盒內，帶回香港的主教座堂。1946年11月15日，一班神職人員、修會及天主教團體成員與公教童軍等一同向神父致最後敬意(圖七)。其後被安葬在跑馬地聖彌額爾墳場專為神父而設的一個地段。儀式由教區副主教戴遐齡神父 (Fr. Antonio Riganti, 1893-1965) 及公教童軍總監陸榮生主持，沒有主教在場。他們均是丁神父在推廣公教童軍時的緊密拍檔，並給予了一段光榮的頌詞。⁵⁰

⁴⁹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 檔案編號: 西貢 IV-14-1.

⁵⁰ 1992年8月23日, 西貢聖心堂曾舉行愈恩聖祭紀念郭景芸神父、黃子謙神父及丁味略神父在西貢殉道五十周年, 由時任林焯焯副主教主祭, 數位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參加共祭, 其中柏路尼 (V. Bruni) 神父更專程由意大利米蘭來港參加, 另外, 郭神父的親人、丁神父意大利家鄉的教友十多人亦來港出席。見《公教報》, 1992年8月28日, 頁1。

誰是兇手？為什麼要殺死丁神父及其餘兩位神父？丁神父與其他神父的遇害經過到今時今日仍然是一個謎。丁神父在戰時對西貢區的基督徒及非基督徒愛護有加，堅持冒險去探訪他們。但竟在這麼的一種情況之下遇害，是一件令人相當悲慟及深感痛絕的事，在香港天主教傳教史上是一件重大歷史事件。然而在教區的大事年表中，並沒有給予相當篇幅的記載。原因可能是早年因為大家都不敢說話，故此事件的詳情要逐漸才能浮現出來，最終經過一番整理訊息後，才能將本身流於傳言的事情說得清楚。



追 念
丁 神 父
為 主 犧 牲
為 羊 捨 命

在戰爭中香港教區為主犧牲之丁神父骸骨現已尋回。聞於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時在本港聖地舉行安葬禮，並於是日上午九時半在堅道大堂舉行追悼大禮彌撒云。

圖七：關於丁神父的訃聞

但從各種歷史及環境情況來說，丁神父的遇害反映當時戰爭的危險及困局。在日治時期的香港，如果在市區的情況已經很危險及困難，在新界區情況甚至更糟而且更加危險。在廣闊的地區根本不容許日本人能全面控制所有佔領範圍，因此許多地方都由不同的組織所控制著。日本人是第一疑犯，因為他們從不喜歡外國人在他們駐守的地方。但是這個解釋似乎並不令人滿意，因為所有證人均提及有裝備且外表為官兵的中國人，但沒有識別他們是日本人。遇害後一年，當恩主教向日本當局質疑是，他們只會回答：「我們仍在調查中。」

恩主教的調查令他自己亦相信：「暗殺者肯定不是來自西貢，在這裏神父做了很多受人愛戴的事。他們應是鄰近區域的土匪，從淡水及大鵬灣偽裝成狙擊手。這些人將傳教士看成為日本的間諜並畏懼他們。」他認為行兇者是「來自中國的土匪」，因此他將這件事知會教會當局。然而早在 12 月 22 日，當他將事件通告在香港的日本當局時，已明確指出：「所有這些謀殺均帶有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在新界地區共產黨很有組織，其成員更有時冒險進入九龍。」⁵¹

因日本佔領而引致的極度混亂及困難處境造就了一些殘忍的組織、強盜、牟取暴利的人與共產黨游擊隊聯盟，並將某些天主教堂佔用成他們的宿舍。在這個殖民地領域，因為接近中國本土，他們很容易進入及離開，並利用這種方便進行威脅及破壞。最有可能的是天主教神父因他們深得人民的信任及能發揮影響力，他們又看到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因此進行一些勾當的人會對他們懷恨在心。郭神父的失蹤令黃神父及丁神父想知道更多關於他的命運所繫。他們收集到的資料可能是其中

⁵¹ 見香港教區檔案處，Valtorta > Oda, 1942-12-22 報告, 檔案 I-25-1。

一個令敵人想消滅他們的想法。根據以上所提及的調查結果和口述歷史研究，許多西貢人均認為游擊隊應負起謀殺責任。一般相信，儘管沒有證據證明，該些游擊隊應為三位羅馬天主教神父在日治時期的死而負責。其中一位是意大利籍的丁味略神父。在所有三個個案中，很明顯地他們是被殺，雖然沒有找到行兇者。⁵²

結語：依照上主的心行事而殉教

對丁神父的種種活動不可能簡單地作出概述，對他的多元個性則更難作出描繪。丁神父有持續不衰的熱誠，而且他有一顆富於進取的心。他有非凡的腳力，令他可以步行長程到未知的地域，建立新的連繫及傳播福音。他的天賦是有無比的與勇氣，他總是準備好要與權貴抗衡，甚至更能捍衛自己的信仰，就算有異教者來找他協助，他亦熱情及友好地款待他們。他從不猶豫地面對無理取鬧的人，為了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法，不吝嗇與人爭論不公平的個案。

「當他揸起十字架，傳教就有十足準備了！」，是丁神父所用的詞彙，並可以被視為他生活的格言。他堅定地相信與主結合直至完全犧牲是每一位對基督完全地付出的傳教士，亦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滿全而基本的量度。有許多香港人認為「丁神父的犧牲，使香港的傳教任務失去了一位被學習和神聖的神父」。恩主教亦確認「謙恭和簡單、非常積極和勇敢，他是主教任何計劃的右臂。」⁵³ 正如Fr. Gerardo Brambilla (1866-

⁵² 引自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kung, 1940-1950: The Oral History Project* (Hong Kong: 1982), p. 52.

⁵³ 引自《天主教傳教事業》，1946年12月16日。

1943)所指：「香港傳教應為失去丁神父而深深感到是一大損失：他的天賦加上忠信及富於誠懇的品格，使他成為代牧區珍貴的合作者。」⁵⁴

丁神父頑強的忠信與可用性被和諧地整合後，明顯地展示在他的言詞和行為中。他的個性是在犧牲精神和他對傳教工作的熱誠中成型的。他並不只是在熱烈的時刻中表露出來，而是像細水長流中的承諾，而且有時是更過之而無不及。穀祿師神父（Fr. Riccardo Brookes）更憶起：

「丁神父因為自我更新與和藹可親，加上談話中富幽默感與及他對中國人的那份真摯及充滿樂觀的情感，而使人對他不能忘懷。結合健康及充滿了追求更高的熱誠，他不斷探索未知領域。他很想長久地建立的基督徒社群能由本地神父所看顧，外國傳教士便可以專注於去找尋處女地。」⁵⁵

Fr. Antonio Lozza (1890-1980) 強調：

「年輕傳教士欣賞他是一位依照天主的心而行事的神父。其中一位表示：『沒有他尊貴的思想所激勵，以他作為榜樣，我是不能更虔誠地去過我的傳教生活。』丁神父的真正謙遜來自他沉默工作的那種天份，沒有自滿、從不冒犯任何事他經常都可以明白及原諒別人。

他貧困，事實上，他的貧困是神聖的志向。對於他信任的人，他就拿起錢包和語帶相關地說：『主教給我三毫子，老實說，我並

⁵⁴ G. Brambilla, *Il PIME e le sue Missioni*, Vol. V (PIME : Milano, 1941-1942), p.448。

⁵⁵ 見 *Il Vincolo*, 1943年1月30日。

「不想要更多，因為我不想比他少！」他並不知道如何花錢：你可以從他修補得挺好的祭衣、不合身的鞋子估得到。他就是從那些舊盒子中的丟棄物件中找出來，由一位被委托的女士負責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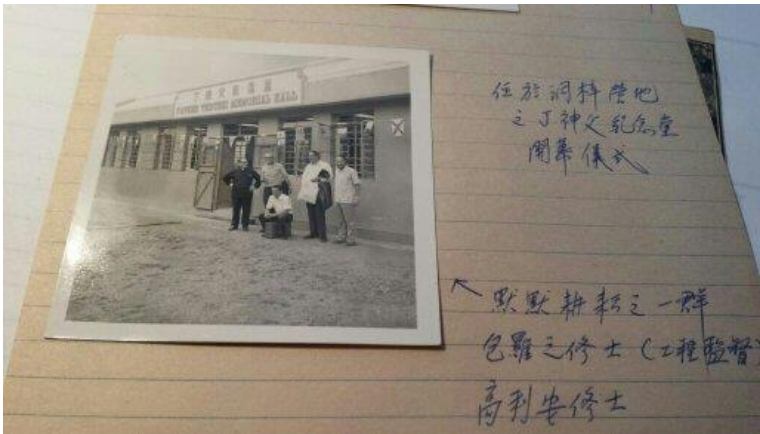
當他收到從意大利寄來的包裹後，還未拆開，他很快便將其分配給生病和住在醫院的病人。他是一個樂觀的人！他相信天主的話語：那些默默耕耘的人會在喜樂中團聚。難怪他深受中國人愛戴並視他為他們的一份子。」⁵⁶

隨著年齡的增長，丁神父的精神仍然十分年青：他從來不會因健康而迴避責任，因此沒有浪費了他在西貢所接受的清苦訓練。他神貧的精神、他的慈善、他縝密的工作風格、以至他的慷慨均遠遠超出常人：他只需微不足道，便可以將獲得的給予那些窮人。

「我看不到丁神父不能被視作烈士的原因！」。江志堅神父認為這是從在西貢工作的人及由當地人所蒐集的珍貴證據中可以確信的。「由兩個非常可信的地方可以證明他是一位烈士。首先，他將自己貢獻給一個危險地方-西貢，為的是要照顧那裡的人的靈魂，傳播福音及獲得天主的榮耀。他確確實實地為他的羊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對一位烈士可以要求更多嗎？其次，那些殺死了神父的人是來自共產黨的游擊隊：他們屬於一個對任何宗教都懷有敵意及仇恨的政黨，這些人比義和團更為殘酷」。

⁵⁶ A. Lozza, *Sangue Fecondo* (EMI: Bologna, 1981), pp. 146-147。

雖然不可能指出丁神父是為了信仰而殉教，但事實上他在服務與傳教上永遠持續奉行絕對有效的價值。他自己亦說：「殉教是上主給予的恩寵」（圖8）。他的美德、對召叫的忠誠及為救贖靈魂的絕對奉獻，使他確實值得去實現這種謙卑而秘密的抱負。



圖八：位於大埔洞梓童軍營地的丁神父紀念堂(Father Teruzzi Memorial Hall)

附錄：丁味略神父(1887-1942)年表

年份	日期	事件
1887	8月17日	出生於米蘭的萊斯莫鎮 (Lesmo)
1900	-	加入米蘭教區神學院，研究哲學及神學
1910	9月29日	加入米蘭外方傳教會
1912	6月29日	在米蘭大教堂晉鐸為神父
	11月2日	離開意大利被派到香港
	12月5日	開始學習中文，同時擔任西貢的羅奕安神父 (Fr. Angelo Ferrari)的助理
1914	11月	賦予新界區的責任
1927	11月19日	被任命為秘書長、禮儀主管、檔案主任及修院的神師
1930	-	監獄神師、寶血會助理，童軍神師及公教童軍運動的倡議人
1933	1月	出任主教座堂主任司鐸，直至1934年1月
1937	4月20日	回到意大利，被任命為Villa Grugana PIME 學院院長。1938年轉至 Treviso
1939	11月23日	回到香港和恢復於教區主教公署的職務
1942	10月5日	返回西貢地區
	11月26日	在大洞被擄並殺害，棄於海中
1946	11月15日	骸骨安葬於跑馬地聖彌額爾墳場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life of an Italian missionary priest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the war period. The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Fr. Teruzzi when he was initially sent to evangelise in Sai Kung, New Territories. Then he returned to Italy serving in the seminary as the priest but still never forgo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e finally stepped the land again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hristian service with persistent love and faith to the Lord until he was most probably killed by the Communist guerrillas, with the excuse of collabo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This article is not to write from "Who is the culprit?" point of view, but through the traits of all deeds, regardless of the truth, the martyr's sacrifice was revealed genuine as they witnessed Christ's love,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Fr. Teruzzi's zealous quest for dedication of life and faith has overcome the fear of death, once again amongst us live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encourages everyone to seek the truth in the mystery of life, and ready to push us to love the Lord with sacrifices made.